

考古学视野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路径

王建华 周丽

【摘要】考古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后来该称谓多见于民族学和历史学著作中。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理论的正式形成。此后学界掀起了一场多视角、多维度、多学科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热潮。考古学作为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一门科学,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理论方法上,文化-历史考古研究范式中的考古学文化和谱系研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阐释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实践中,可以从文明探源、民族考古、公众考古三个方向开展考古工作,以此增强文化自信、建立民族认同、传播文化史观,有效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考古学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简介】王建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史前考古、人口考古(四川 成都 610041);周丽,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西南考古(四川 成都 610041)。

【原文出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成都),2023.7.19~28

【基金项目】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考古学视野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要求既要解决好物质层面的困难与问题,也要从精神层面引领解决好民族问题。之后,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并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这不仅为全党上下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此,“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称谓开始频繁出现在国内外的各类媒体报道和学术论坛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积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并要求全党上下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3]。与此同时,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题一跃成为学术界研究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和深入研究,研究成果呈现出了多学科、多视角、多维度的特点。众所周知,考古学既是人文科学的重要领域,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构成,作为“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4](P.2)},通过其研究内容、研究理论、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目标等

特点,表明考古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形成的重要依据。不过,就目前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从考古学视角系统回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并不丰富。2021年,霍巍从“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深化对中华民族整体面貌和形成轨迹的历史认识”两个层面论述了考古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贡献,为考古学视野下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and 示范。^[5] 本文梳理概述了“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由来和内涵特质,尝试从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层面出发,深入探讨考古学视野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路径。

一、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

追溯“中华”一词的历史渊源,最早见于西晋末期。在当时“胡人”大举入侵进犯中原的复杂社会背景下,“中华”是中原土人为了将自己的政治文化同“胡人”区分开来而产生的一种自我称谓,这一概念可谓汉人和胡人在冲突、互动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产物^[6]。自古以来,不同民族之间有交往有互动多发生相互融合,而“中华”一词从本质上讲也体现出了民族交融的历史史实。“民族”一词也是古汉语固有的名词,用于表示宗族之属或华夷之别,中国近现代“民族”(nation)观念的形成,是受到日译西书的影响^[7]。伴随着各种新思潮的引入和传播,以及现代民族意识的萌芽和发展,“中华民族”一词逐渐崭露头角。

1902年,梁启超撰写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提及“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8](P.33)},自此“中华民族”这一称谓首次被提出,不过此处的“中华民族”指的应是汉文化群体。1905年,梁启超撰写发表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文章当中则较为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对其内涵也进行了相关阐释和探究,比如文中所涉及的研究问题之一、二:“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自初本为一民族乎?抑由多

数民族混合而成乎?”以及“若果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则其单位之分子,今尚有遗迹可考见乎?”此处提及的“中华民族”虽然指的仍是以汉族为主体,但在梁启超看来,“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中华民族混成之后,尚有他族加入……中华民族,号称同化力最大”^{[9](P.76-86)},这也反映了当时多民族融合的观念已开始萌芽。1922年,梁启超又发表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当中进一步对“中华民族”这一称谓的概念、形成、演化的历史轨迹以及内部的各种复杂成分等作了全面的研究与阐释^{[10](P.374-400)},他在文中点出了自己的真实用意,就是要让广大学者和民众知晓中华民族是历经沧桑并付出了极大代价才形成的一个复杂而稳固的民族,将来不仅不会衰落,反而会有进一步融合扩大的可能。也正是通过此文,梁启超开始着重强调“民族意识”,文中提到“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他认为民族意识的形成就是“对他而自觉为我”,换言之:凡是面对其他族群时,能够下意识中自觉浮现“我为中国人”的观念,“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由此看出,此时的“中华民族”已然完全具备多民族多元融合的特点,并且这种融合还将不断延续扩展。梁启超率先提出并阐述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概括了国内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最初萌芽和起点。

1939年,顾颉刚撰写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彼时正当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他从中国疆域走向统一、血统走向融合、意识趋向同一的历史事实角度深入讨论了中国境内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路径,向世人喊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11](P.94-106)}顾颉刚认为,“中华民族”这一称谓虽然是到了近代才出现,但作为一个实体,它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在他看来,“整部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民族的融合问题”^{[12](P.109)}。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在认同意识上经历了从“自在”升华为“自觉”的转化过程,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

个”的论辩,实际上阐释的是中华民族意识自觉凝聚的观点,这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建构历程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他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理论角度分析,并指出了“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汉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鲜的血液,汉族同样也充实了其他民族”,以及“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发生混合、交杂”。^{[13](P.478-519)}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阐述的历史视角与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是关于中华民族逐渐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论述十分接近。不同的是,费孝通重视考古学材料对于中华民族“多元”的阐释,并从人的体质特征和民族迁移、人口流动的角度来认识中华民族这个整体。

从“中华民族”的提出再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在探讨研究多民族融合与文化一体化的过程中,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人都选择了从民族史的角度去分析和阐述,而正是由于数千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交流和融合,才促进形成了当今的“中华民族”,这为后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夯实了理论基础。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系统梳理目前可见的考古材料和文献古籍,可知是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最早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1962年,夏鼐发表了《新中国的考古学》,在谈到通过考古研究去探索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时,他提出在社会复杂进程中正是由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先人同汉族的先人建立了密切联系,才构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14]1979年,贵州省博物馆李衍垣发表了《贵州文物考古三十年》一文,文中不仅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贵州的重要考古发现,还进一步提出贵州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很早之前便同中原地区先进的汉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自古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15]其实,夏鼐当

时也已经意识到了从考古材料上可以一窥从史前时期到历史时期汉族的形成演变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国外“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的传入^[16],其新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吸引了学界诸多学者的关注和探索,以古代少数民族遗存为主体研究对象的中国民族考古被认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无异于常规意义的考古学”^[17],而谈及民族考古学,学术界却出现了只论 Ethnoarchaeology 而不提区域民族考古的现象。因此,考古学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重要的概念并没有作出过多的回应。相较于此,“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语却在民族学界和历史学界频繁使用^①。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

尽管中国考古学界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看似昙花一现,但我们从中可以清晰认识到,无论是对“中华民族”还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阐述和研究中,考古学成果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可以说,没有考古学材料的有力支撑,我们不仅无法了解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对其后续的发展、凝聚成一体的过程也会存在很多认识不清楚的地方。而作为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在其阐释和论证中也离不开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中国考古学必然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阐释和体系构建,以及推动各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基础

中国疆域幅员辽阔,自史前时期起就有众多族群散布其中,历史时期以来逐渐交融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创造出璀璨的历史和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

体格局”^[1]。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各民族此消彼长,从史书史料中亦可查寻到许多古老民族的记载,各民族在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过程中延续下来,最终融入今天的56个民族之中。但就中国当代的民族来看,能够传承并保留下来自己的民族文字与历史记载的却屈指可数。如果仅仅是依托历史文献去建构整个中国的民族史,那么大部分的民族,特别是那些已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消失湮灭的古代族群将无史可考、无迹可寻、无物可证。纵观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其中真正考证有文字记载的古史不过四千年而已,剩下的历史更多的还是要依靠考古学的材料,唯有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去进一步推断和填补历史演变中缺失的环节。对此,夏鼐曾一言中的,他提到“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14]。考古学让各民族在历史上留存下的物质文化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只要有人类生存和活动的地方,或多或少都会遗留下来些许痕迹,而考古发现所涉及的古代遗迹和遗物等正是实物遗存的直接体现。考古学家能够通过研究这些物质文化遗产去分析和推演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进程,这些珍贵的考古资料不仅充实了中国史的内涵,还极大扩展了历史特别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间,即霍巍所指考古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5]。

历史是一个群体共同的记忆,群体记忆让群体有了归属感,这对于群体身份认同的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考古学对于构建古代史,特别是构建史前史的价值和作用其他学科都难以替代的,它能帮助找到现实中存在的具体实物证明,让“民族”这一被称作“想象的共同体”不再是虚幻,通过考古找回的历史记忆,让人们认识并了解到在遥远的古代大家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便提供了民族国家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础^[18],考古学也因此参与到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经过一个世纪的考古实践与探索,一批批的考古学家发掘出土了丰富的文物,证实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拥有着悠久的渊源,自史前时期到

历史时期都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曾试图将中华文明归为“西来”的学说不攻自破。考古发现所带来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关于物质决定意识最充分的体现。

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提出了以往的古史都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19](P.60)}。李玄伯则撰文发表了《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其中提出“走考古学之路”,通过考古发掘去寻找真实史料。^{[20](P.268-270)}傅斯年针对重修国史的出路,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口号,力求通过考古寻找重建古史的新材料。^{[21](P.47)}考古出土的遗迹、遗物等实物遗存都是可以观察的,较之文字记载,其分析和推究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得到验证。中国考古学从诞生之初就肩负起“重修国史”的任务。随着考古学学科不断发展,证经补史只是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部分。尽管考古学以发掘出土的实物遗存为主要研究内容,但考古学研究的核心目标在于揭示遗存背后人类文化的整体面貌,考古学研究最终还是要着眼于人群,以实现“透物见人”为研究目标。这里的人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定位到族群或民族,这就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产生与形成过程,提供实实在在的物质理论基础。而如何以物论史,让考古材料说话,达到“透物见人”的目的,就离不开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文化-历史研究范式作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流范式^[22],是追源溯流,实现“透物见人”的重要手段。而考古学文化和文化谱系研究便是文化-历史考古研究范式中最基础、最典型、最具中国特色的理论与方法。通过考古学文化的梳理和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我们可以深入探究民族的族源,进一步理清中华民族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研究提供坚实的考古学理论支撑。

(一)考古学文化

19世纪后期,文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学中用来总结分析考古出土的遗存。1925年,柴尔德编著

出版了《欧洲文明的曙光》，书中较为精准地概述了考古学文化的定义，即“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23](P.4)}。与此同时，文化-历史研究法也成为考古学研究的经典范式^[24]。自此，考古学文化开始成为一个基本单位并以此从时空上编排考古资料，它的出现是考古学从“研究物”到“呈现人”这一过程转变的关键环节。1959年，夏鼐将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引入中国，从中国考古学实际情况出发对其内涵进行了阐释，尤其是在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上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25]此后，作为考古学研究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术语，学界对于考古学文化的定义与命名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其中，俞伟超认为历史上一定时间和空间内一定的人们共同体常常能创造不同于其他人们共同体的文化，而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总和正是通常所提到的考古学文化。^{[26](P.113)}严文明同样提出所谓的考古学文化就是那些能够在考古学遗存中观察到的，存在于一定时期与地域内的且具备一定特征的共同体。^{[27](P.78)}赵宾福认为考古学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概念、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上看，它反映了人群共同体与物质文化共同体的相互对应关系，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社会性法则，而从理论的角度上看，它又是通过分类和聚类研究遗存去区分遗存所代表的人群或族群。^[28]刘庆柱、韩国河则从夏鼐、安志敏、特里格等学者对于考古学的定义中总结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目的是寻找时代、分布区域相同的人群所拥有的共同物质文化遗存，它们是同一人群、族群的社会共同体反映”^[29]。基于上述讨论，笔者认为考古学文化虽然被用来描述一群物质文化遗存的共同体，其实是指人群创造的一段被物化的历史，其背后“隐藏”着古代不同的人群共同体，即族群或者族别问题。

我们知道民族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包括历史上从氏族、部落、部族直到现代民族的各种民族共同体或人们共同体”^{[30](P.1)}。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不仅能在物质层面上得到表现，也同样能在精神层面上得

以呈现。从理论上来说，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的考古学文化是古代群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但是，在某种层面上来说，考古学文化也可以与民族共同体建立起一种紧密的联系。苏秉琦提出由于人类活动的地域环境和自然条件是有差异的，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和方法不同，所以生活和活动的方式也具有明显不同的特色，不同的人们共同体必然会遗留下具有独特特征的物质文化遗存。^[31]严文明也认为考古学文化形成和发展主要有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文化传统三个方面的原因^{[27](P.82-86)}，这与民族的形成有着相似的背景，更深层次地揭示出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群与族群或者民族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张忠培则认为在人群划分上，考古学的划分依据不同于民族学，是以考古学文化来区分人类的不同群体。^{[32](P.144)}尽管我们不能随意地将考古学文化与族群或民族对应，但是在诸多考古学证据和线索下，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合理解释的可能，理由是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遗存是一群有着共同文化心理追求、风俗习惯、审美传统的人所使用和铸造的^{[33](P.31-32)}。其实，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民族共同体间的联系，才会有“三皇五帝”及其部落战争历史传说和记载。有学者认为，现存古籍史料中所记载的一族，有的可以归为一类考古学文化，有的则是包括了几个考古学文化，未见有一个以上的族共用一类考古学文化，这表明古人对“族”的认定是准确且符合实情的^{[34](P.75)}。因此，在对某一考古学文化认识足够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尝试将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古族相对应。虽然现存的历史文献中对汉族以外的其他古代民族记载的资料是少之又少，并且不成体系，加之历史文献还杂糅了各个朝代的认知与传说，仅仅单纯将考古学文化梳理对应历史上的古族是有一定风险的。但在一定层面上，也是可以将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处或某几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族属之间建立起联系的。例如：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35]，学术界多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古代夏族留下的物质文化遗存^②。又

如:据童恩正考证,著名史学家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一书中,曾将中国上古时期的居民大致划分为了三个民族集团,分布在北(河洛)、东(海岱)和南(江汉)三个区域”,“其科学性已经为近年来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新发现所证明”^[36]。再如:巴蜀文化的形成是多次族群融合的结果。巴文化和蜀文化的第一次交锋的时间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晚期,从考古学上可观察到的是三星堆文化的消失以及十二桥文化的出现。笔者在分析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过渡期的陶器遗存中发现,大致在商代晚期有一波新的文化因素(十二桥主体文化)突然进驻成都平原,并在商末以前完成了对三星堆文化陶器群的完全取代。^[37]十二桥主体文化因素以整体突然出现的方式到来,改变了成都平原原有的文化面貌和社会格局,这种变化不是缓慢演变而来的,而是一种突然的转变,其背后所反映出的,不管是外来文化入侵也好,抑或是文化间的交流影响,必定都与人群的迁移有关,而这次迁移即江章华所提出的“巴人西迁”^[38]。也就是说,至迟在商代末期,西迁到成都平原的巴人已完全融入古蜀社会文化中,完成了巴族和蜀族的第一次融合。至此,巴蜀文化圈开始形成,为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文化圈奠定了基础。因此,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可以用来揭示人群的变迁,某种层面也可能是族群的变迁,通过考古学文化的梳理和研究,我们可以观察到古代族群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类似韩建业提出的“变迁法”,即“考古学上的巨大变迁一定程度上证实文献传说中的重大战争或迁徙事件的方法”^[39]。由于不同群体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日趋密切,人群的时代、内涵和地域特征也会随之变得愈加复杂,这也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模式,不仅可以揭示出该区域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特殊路径,也能为今天民族的相处之道提供参考蓝本,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文化谱系研究

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工作者解读阐释史前史的

重要工具之一,伴随着考古学工作的深入开展,众多史前考古学文化被识别和区分,考古学文化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而谱系研究将这些考古学文化以一种标准结合起来,使各文化的源流变得清晰连贯。对此,霍巍提出要切实考虑到各地历史发展的考古学谱系和文化特征,促进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并重,通过相互印证,准确构建出能够反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考古学理论。^[40]

20世纪40年代,基于对考古类型学的理解和应用,苏秉琦通过对陶鬲谱系的梳理,实现了考古学谱系方法的最早实践。此后,张忠培^[41]、严文^{[42](P.126-172)}等学者在实践中对这一方法论进行了不断丰富、完善。1986年,张忠培概括提出了考古学文化谱系论,他认为文化的传播与迁徙是真实而广泛存在的,诸多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借鉴、交融、同化甚至分化,都能让某一考古学文化演变成不同文化谱系的多元结构,而不同谱系的文化因素又将结合形成统一的考古学文化。这些文化因素,都能够通过类型学的对比研究而明晰其源流。^{[43](P.175)}

20世纪70年代末,苏秉琦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又称“条块说”,可谓是谱系研究的集大成。该理论把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才真正得以初步建立。^[41]此后,该理论指导各地立足于各区域,有效梳理了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以及地区间诸多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学术界也愈发明显地认识到这种理论就是一把寻找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进而探索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宝贵钥匙。^[44]俞伟超曾肯定性地指出,区系类型理论为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建立起了沟通联结的桥梁,既能让考古学材料按照一定历史框架和位置去研究其物质、社会、精神等层面的情况,也为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5](P.182)}

不仅如此,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这一重大课题研究的重要基础之一,它从宏观上阐明了把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的基础结

构^[46]。各区域中的各文化系统相互交流,不断吸收新鲜的血液、获得新鲜活力,文化间相互渗透并完成重组,最终殊途同归,趋于融合。区系类型理论掀开了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对专业文化的研究,极大地开阔了当时一众考古学家的观察视野,让学界走出了对中国古史认识的“两个怪圈”,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课题的突破提供了可能。^{[47](P.1-5)}考古学的研究曾经在一定时期将重点放在了中原古文化上。^[48]

在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之下,诞生了“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49](P.89-114)}“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50]“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3](P.478-519)}等重要认识。因此,区系类型理论从考古学的研究视域也势必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而重要的基础。

三、考古学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需要发扬光大。^[51]而各民族遗留下来的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都需要依靠考古学工作来得到更好的呈现。考古印证历史,考古带来新知,考古学肩负起构建和展示中华民族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任务。俞伟超认为,人们若能亲眼看见中华璀璨文明的具体形象,至少在感官上要比看几本书或者听几堂课强烈得多。^[5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考古学实践的贡献。

赵宾福基于中国考古百年取得的诸多成就,认为以夏鼐、苏秉琦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批考古学家坚持走中国道路,探索并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是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理论方面取得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果。^[28]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51],我们要时刻铭记一代代考古学者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通过细致严谨的考古工作去更好地认识和阐释中华文明,从而为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提供坚强的支撑。

在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做好考古工作的要求和中国特色考古理论方法的指引下,我们认为当前可从以下三个方向开展考古学实践工作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文明探源,增强文化自信

中国文明探源从广义上讲也可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探源。我们为什么开展文明探源工作?苏秉琦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回答过这个问题: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印度共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其他三个古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就发现有距今五千年的文字、城郭、金属等考古实物遗存,在这个时间段中国却只发现了商周以后四千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据,于是传颂“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庄严形象,只能用《史记·五帝本纪》中的传说来替代。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史就少了1000年的考古实证^[48]。不过,随着中国考古学研究资料的不断丰富以及多学科融合研究的深入,我们通过考古文明探源来延伸中华民族的历史,找到了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考古实证,让我们的古史传说有史可依、有迹可循,从而证明“三皇五帝”的口头传说与历史记忆是有原史为依托。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传承了数千年且期间未曾中断过的文明,而考古学正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揭示中华民族史前史的唯一手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关于对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以及国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探索研究,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主线和重要方向,从一定程度上讲,相关问题的话语权还是掌握在考古学家手中的^[53]。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了考古组,着手开展安阳小屯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从此开启了考古学探索研究中国文明化的历程^[54]。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在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国家起源的“三部曲”,即发展模式的三个类型:古国-方国(王国)-帝国^{[55](P.115-152)}。之后李伯谦又将其进一步阐述为由以红山、凌家滩、仰韶古国为代表的酋邦,发展到以良渚、陶寺为代表的王国第一小阶段,

以夏、商为代表的王国第二小阶段以及以西周、东周为代表的王国第三小阶段,再到秦一统至清灭亡的帝国阶段,这就构成了古代中国文明和国家的起源、形成、发展、衰亡的全过程。^[54]最近,王巍又提出了当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冲破了以冶金、文字、城市组成的“文明三要素”的桎梏,他认为判断中国迈入文明社会的标准,不同于世界其他的古老文明,而是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观察判断: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了城市;二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化明显加剧,出现了阶级;三是权利逐渐强化,出现了王权和国家。^[56]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成果足以实证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曾有过不同的文明中心,各区域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碰撞、相互交融,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考古学发掘得到的实证材料,让人们能够切实了解我们的民族、国家、文明的进程,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之所以中华民族能够融合形成一个团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且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根源于数千年来多元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使其拥有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二)民族考古,建立民族认同

这里的民族考古主要指的是通过古代民族留下的实物遗存来研究民族的社会与历史,与宋兆麟提出的民族地区考古大致相同^[57],是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如鲜卑考古、巴蜀考古、百越考古、西夏考古等。王仁湘认为这类考古属于“边疆民族考古”^{[58](P.103-106)},它与国外传入的 Ethnoarchaeology(国内多翻译为“民族考古学”)有着较大的区别^[59]。翁独健认为历史上的中国不仅仅单指中原王朝,也包括了除此之外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或政权。^[60]民族考古的着眼点在于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民族考古的研究成果对于复原民族史尤为重要。

1956年,费孝通在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民族地区及其有关地区的考古工作当中使用民族

考古的材料去解决民族学中存在的问题,例如:某一民族作为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是怎样在历史上形成的?他们之后如何发展?何时融入汉文化?等,概括起来主要是解决民族史研究的终极问题,即一定区域内人们共同体的发展和变化的具体过程^[61]。同年,《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以下简称《规划》)出台,而“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工作”正是《规划》当中第二部分“中心问题及题目”的第二项,《规划》将这一课题分为了六个子课题,涵盖了全国五个自治区以及几乎所有的边疆地区,即“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考古工作”“西北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考古工作”“东北地区有关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化的探查与研究”“内蒙古自治区的考古”“青藏地区考古”“台湾地区考古”^[62],这六项子课题基本奠定了后来中国民族考古的基本格局^③。1962年,夏鼐指出考古研究对于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有着巨大价值和作用,从考古材料上可以观察到汉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个形成过程。^[14]此后,以费孝通^{[13](P.478-519)}和陈连开^④为代表的民族学家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都引用了民族考古的材料。

民族考古的研究成果除了复原民族史以外,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建立民族认同。何为民族认同?费孝通认为民族作为“他者”视角下的概念,普遍会经历从“他称”转为“自称”的演变规律,而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只有经历了同非己族类的“他者”接触后才会产生民族认同,也就是所谓的民族意识,因此,民族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13](P.486)}如果说文献记载中的民族史料是一种“他称”的视角,那么民族考古恰恰是以“自称”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科学严谨的考古学不仅可以通过考古发现去进行观察分析,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研究验证推断的结论。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遗存,作为实实在在的物质材料,不会说谎,它展现给我们的就是古代民族所体现出自身特征,就像在以“自我”的视角讲述着自己的史实。例如: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对西南地区少数

民族的总体概括是“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63](P.2991)}，但当时的司马迁是以汉族正统的视角看西南，显然在司马迁看来西汉早期的巴蜀已经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将其放入蛮夷一列。当我们来梳理考古材料可以发现，秦灭巴蜀之后，巴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大约从秦末汉初，中原文化的陶器开始出现在巴蜀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至迟到西汉中期，巴蜀地区从考古学文化上表现出已完全融入汉文化之中^[64]。考古材料与司马迁他者视角下的记载基本可以对应，反映出古代巴蜀族民的民族认同确实在西汉时期发生了转变。这种认同的转变不只出现在“他者”的文字记述中，更是通过民族自身得以展现。正如费孝通所说的，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是在同西方列强的持续对抗中逐步形成了自觉统一的民族实体^{[13](P.55)}。民族，是稳定的，但不是凝固的人们共同体，民族是历史的产物，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65]，考古材料所揭示的正是—一个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国自古史传说时代起就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秦汉以后形成了一个不断融合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间不断增强的历史文化认同感以及共同的价值观正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根深蒂固的凝聚力。

民族考古研究成果与民族史文献之间的整合，是回答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中的特色。我国民族考古开展的时间很早^⑤，近年来民族考古在学术界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云南大学民族考古研究与文物鉴定评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古研究所等科研中心的相继成立，基本形成了以北方民族考古(包括西北民族考古)、东北民族考古、西南民族考古和华南民族考古为主体的区域民族考古格局^⑥。以蜀文化、滇文化、西夏文化、高句丽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周边地区及边疆地区考古发现，为探索研究古代民族、文化、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和格局提供了客观翔实的实物资料。丰富

的民族考古成果向我们呈现了我国古代各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逐渐趋于统一的历史史实。这些对于深刻认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进而推动各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 公众考古，传播文化史观

我国历来重视文物考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了“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66]的重大任务，并强调要努力做好各类古迹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研究与阐释，更加清晰全面地反映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以及对人类的贡献。2021年，适逢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对百年考古工作取得的诸多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同时鼓励考古工作者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地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考古工作肯定的同时也对考古学寄予了“展现成果、阐释历史”的希望。“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中也提出了要加强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传播^[67]。考古学是一门严谨性较强的历史科学，也是一门很接地气的人文科学，向社会和公众宣传普及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是考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考古工作者既要秉持科学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也要及时转变思维、创新思路、丰富手段，用公众易于理解的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展示出来，让公众更加明白考古学的工作方式和目标，让他们真正了解考古学在探索人类起源、中华文化起源、中华文明起源以及中华民族起源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从而树立正确的民族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走向公众是考古学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而考古学之所以具备日益开放的公共性，最根本的原因是身为中华儿女的我们都渴望了解过去、了解历史，进行属于自己的寻古溯源和寻根问祖^[68]。李飞认为“在古代文化遗产与现代公众之间，考古学像一座桥

梁,沟通古今”^[69]。虽然“公众考古”或“公共考古”的概念是从国外传来,但这种理念在中国考古学界早已有的^[70]。20世纪50年代,苏秉琦撰写发表了《如何使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这篇文章可谓中国考古学公众化理念的最早源头。^[71]严文明回忆早年在工地发掘时,会在发掘现场做展示,给当地老乡讲述发掘成果^[72],这其实就是早期的公众考古学实践。再比如林沅早年在洛阳王湾遗址实习,发掘结束便就地办展,展览期间为当地老百姓进行讲解,也属于公众考古。^[73]2011年,为纪念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以及仰韶文化命名九十周年,中国邮政特别发行了《仰韶文化·华夏之光》系列纪念邮票,说明河南渑池的仰韶村作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这也是考古学走向公众和社会最直接的体现。

近年来,国家和社会大众对考古学越来越关注和重视。方向明认为公共考古不是纸上谈兵,也不应蜻蜓点水,考古工作者应当秉持科学严谨专业的职业精神,及时准确地向社会 and 大众展示考古工作对于构建中华民族历史、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等方面起到的巨大作用和影响。^[69]公众考古要通过传播考古学发现与研究成果,让博物馆里的文物、考古现场的遗存、研究著作中的文字都活起来。公众考古要在不断丰富全社会文化滋养的同时,构建起集体记忆和社会认同,从而铸牢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开展公众考古活动作为引导大众重新认识历史、认识地方的有效途径,正是中国考古事业发展中的一项重聚社群和民族、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力的关键环节。

结语

考古学是利用过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去研究古代社会和历史的一门科学,其考古发现是能够用于观察的,而分析探究得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当是可以验证的。因此,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是回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考古学“透物见人”的学科目标以及文化-历史

考古研究范式对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支撑,探讨了考古学文化与谱系研究在探寻族源和族群发展史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并据此提出了从文明探源、民族考古和公众考古三个方向的考古实践来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自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提出,已然过去了近百年的时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治国方略在党的民族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我们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民族历史观,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秉持依托历史、直面现实、着眼未来的原则,积极支持和参与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尽到学人的职责和担当。要充分发挥考古学在实证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作用,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不断提升民族自信、建立民族认同、传播民族史观,奋力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注释:

①参见:李丕显.民族审美意识三论[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1).周维衍.谈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完成形式——兼与黎澍同志商榷[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3).周星.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术评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4).

②参见: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J].文物,1986(6).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C]//陕西省文物局编.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戴向明.夏文化、夏王朝及相关问题[J].江汉考古,2021(6).

③参见:佟柱臣.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M].成都:巴蜀书社,1991.王恒杰、张雪慧.民族考古学概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郑君雷.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④参见:陈连开.怎样阐明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国家[J].历史教学,1979(2).陈连开.关于中华民族结构的学术新体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评述[J].民族研究,1992(6).陈连开.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J].思想战线,1993(2).

⑤1928-1935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等地调查和发掘,团队中的黄文弼因此也成为中国现代西域考古事业的奠基人。参见:傅振伦.百年来西北边疆探险年表[J].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1951(5).1938-1940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对苍洱地区史前遗址进行调查发掘,这是云南境内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也是较早在民族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的典型案例。参考: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甲编)[M].国立中央博物院专刊乙种之一,1942.

参考文献:

[1]新华社.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J].中国民族,2014(10).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03).

[3]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光明日报,2021-8-29(1).

[4]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5]霍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考古学贡献[J].历史研究,2021(1).

[6]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东晋南北朝至隋唐胡汉融合与“中华”词义嬗变[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

[7]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J].民族研究,2004(6).

[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三集·论著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9]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M]//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五集·论著五.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10]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M]//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论著十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11]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M]//顾颉刚全集·36.北京:中华书局,2010.

[12]顾颉刚.我为什么写“中华民族是一个”[M]//顾颉刚全集·36.北京:中华书局,2010.

[13]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M]//中华民族的多

元一体格局:民族学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14]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J].考古,1962(9).

[15]李衍垣.贵州文物考古三十年[J].贵州民族研究,1979(1).

[16]梁钊韬,张寿祺.论“民族考古学”[J].社会科学战线,1983(4).

[17]徐坚.民族考古学:定义问题[J].江汉考古,2009(4).

[18]陈胜前.考古学有什么用?[J].读书,2022(4).

[19]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0]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下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M]//史料论略及其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2]陈胜前.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与范式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9(2).

[23][英]戈登·柴尔德.欧洲文明的曙光[M].陈淳,陈洪波,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24]李唯.试析柴尔德1930年之前的考古学文化见解[J].北方文物,2020(2).

[25]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J].考古,1959(4).

[26]俞伟超.关于楚文化的概念问题[C]//王然编.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7]严文明.关于考古学文化的理论[M]//考古学初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28]赵宝福.走中国道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J].考古,2021(9).

[29]刘庆柱,韩国河.历史考古的考古学文化阐释[J].中国社会科学,2021(9).

[30]李绍明.民族学[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

[31]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J].文物,1981(1).

[32]张忠培.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M]//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33]俞伟超.关于“考古类型学”问题[C]//俞伟超主编.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34]张忠培.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M]//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35]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

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J]. 中原文物, 1978(1).

[36]童恩正. 精密的考证、科学的预见——纪念蒙文通老师[C]//古代的巴蜀.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4.

[37]周丽. 试论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过渡期遗存[J]. 考古学集刊, 2019.

[38]江章华. 试论鄂西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兼谈早期巴文化[J]. 考古, 2004(11). 江章华. 渝东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J]. 考古学报, 2007(4).

[39]韩建业. 运用多种方法挖掘五帝时代真相[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8-29(006).

[40]霍巍. 新时代考古学需要中国学派[J]. 历史评论, 2020(3).

[41]张忠培. 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J]. 考古与文物, 1980(4).

[42]严文明. 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M]//仰韶文化研究(增订本).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43]张忠培. 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M]//中国考古学: 走近历史真实之道.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44]苏秉琦. “条块”说[M]//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45]俞伟超. 本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M]//苏秉琦著.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46]苏秉琦. 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J]. 考古, 1991(12).

[47]苏秉琦. 两个怪圈[M]//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48]苏秉琦. 中华文明的新曙光[J]. 东南文化, 1988(5).

[49]苏秉琦. 满天星斗[M]//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50]严文明. 中国史前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J]. 文物, 1987(3).

[51]习近平.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J]. 实践(党的教育版), 2020(12).

[52]俞伟超. 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N]. 人民日报, 1994-9-22(001).

[53]赵宾福. 从东北出发: 百年中国考古学的起步与进步[J]. 江汉考古, 2021(6).

[54]李伯谦. 从中国文明化历程研究看国家起源的若干理论问题[J]. 中原文化研究, 2016(1).

[55]苏秉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56]王巍. 百年考古与中华文明之源[J]. 社会科学文摘, 2022(6).

[57]宋兆麟. 加强民族、考古比较学研究[J]. 史前研究, 1986(Z2).

[58]王仁湘. 边疆考古与民族考古学[Z]. “中国边疆考古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 2005年.

[59]王建华. 中国“民族考古学”理论研究述评[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3).

[60]翁独健. 什么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J]. 中国社会科学, 1982(4).

[61]费孝通.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和与少数民族历史有关的地区的考古工作——在考古工作会议上的发言[J]. 考古通讯, 1956(3).

[62]常怀颖. 擘画蓝图:〈跋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中国考古学发展规划研究之一[J]. 南方文物, 2021(4).

[63]汉司马迁. 西南夷列传第56. [M]//史记卷116,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64]向明文. 巴蜀古史的考古学观察[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7.

[65]陈连开. 关于中华民族结构的学术新体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评述[J]. 民族研究, 1992(6).

[66]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N]. 人民日报, 2020-09-30(001).

[67]“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N]. 中国文物报, 2022-4-22(001).

[68]曹兵武. 考古学的公共性及其时代价值[J]. 中国文化遗产, 2022(2).

[69]高蒙河, 魏峻等. 笔谈: 公共考古/公众考古概念下的考古学教育思辨[J]. 中国文化遗产, 2022(2).

[70]高蒙河, 郑好. 论中国公众考古不是西方舶来品[J]. 东南文化, 2013(6).

[71]苏秉琦. 如何使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N]. 进步日报, 1950-03-28.

[72]严文明. 什么是考古学[J]. 公众考古学, 2020(00).

[73]刘聪, 李志丹. 林沅先生谈公共考古与外国考古[N]. 中国文物报, 2012-9-21(003).